

# 语言的社会地位与外地来沪白领青年的语言选择

张晶晶

(华东师范大学 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 上海 200062; 华东师范大学 社会学系, 上海 200062)

**摘要:** 本文是笔者的硕士毕业论文《外地来沪白领青年的语言选择》的一个章节, 文章回顾了我国自建国以来的国家语言政策和上海地方语言政策, 探讨普通话和方言的地位是如何历史性地形成和建构的, 在此基础上分析普通话和上海话的此消彼长如何影响外地来沪白领青年的语言选择。

**关键词:** 普通话 方言 语言政策 语言选择

**中图分类号:** C912.68 **文献标识码:** A

## 1 语言政策

### 1.1 国家语言政策和普通话的推行

从历史上看, 对社会语言的选择与规范产生重大影响的不外乎三个因素: 政治、经济和文化, 其中政治因素是第一位的。标准语的形成和发展, 从古至今受到了来自政治力量的强大影响。

汉语的共同语在古代时期主要是书面语, 那时候称为“雅言”。“雅言”是以周代的主体民族周民族的语言为基础的, 其代表作品是《诗经》和《易传》、《论语》等其他先秦文献。雅言发展到明代开始成为“官话”, 一直到清末民初都通行官话这个名称。官话除了用于官场外, 也用于来自不同方言区的平民互相交际的场合和对外汉语教学。因为官话是以北方方言为基础形成的, 所以也常常用“官话”泛指北方方言。20世纪二三十年以后由于“国语运动”的成功, “官话”一名才渐趋隐退, 而为“国语”所代替。中国大陆从50年代开始将通行全国的标准语改称为“普通话”。目前港台及大部分海外华人仍使用“国语”一名。所以, “雅言”、“官话”、“国语”、“普通话”是先后有继承关系的汉语标准语<sup>[1]</sup>。

普通话是新中国成立至今推行的全国通用的标准语。普通话获得明确的内涵和共同语地位是在1955年“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和“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上, 明确了汉语规范化的标准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 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作为语法规范的普通话”。从此, 普通话被赋予了汉民族共同语的标准语地位<sup>[2]</sup>。国家推广普通话的工作可以大致分为五个阶段: 一、从建国到1955年, 是准备阶段。二、从1955年10月15日到23日在北京召开“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到1966年, 是蓬勃发展阶段。三、十年动乱是遭受破坏阶段, 推普工作陷于停顿。四、打倒“四人帮”、实行改革开放到1986年“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召开, 是恢复阶段。五、之后是再发展阶段<sup>[3]</sup>。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是推广普通话的第一个高潮时期, 国家采取了类似政治动员的形式, 各地群众也以高昂的政治热情响应中央的号召, 由此掀起了一场遍及城乡的学习普通话的热潮, 形成了以说普通话为荣的风尚。1956年2月, 国务院成立了中央推广普通话工作委员会, 并发出《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 做出了一系列针对各行各业的详细的运用普通话规

定。各省市相继成立了推广普通话工作委员会。中央还制定了“大力提倡、重点推行、逐步普及”的推广普通话的工作方针。从1956年起，全国中小学的语文课本开始教学普通话。1958年1月10日，周恩来总理在政协全国委员会所作的报告“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中指出：在我国汉族人民中努力推广普通话“是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同年2月，毛泽东主席号召“一切干部要学普通话”<sup>[2]</sup>。2月11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正式批准了《汉语拼音方案》，为学习普通话提供了重要的工具。这一时期的推普运动取得了一定的成功，很多人都学会了普通话，还出现了像福建省那样的先进省份。针对这一运动，1974年11月21日美国学者Charles A·Ferguson在Stanford大学语言学讨论会上说：“强迫人们只接受一种语言，即使在政权相当稳定的国家里，都有可能成为造成社会动乱的原因和后果。中国看来是个例外。在这个令人惊奇的国家中盛行的‘大家都来出把力’的哲学甚至扩展到语言领域：你可以看到成群结队的学生到工人或社会的其他部门中鼓动大家学习并使用标准语。大家对已经能讲标准语的人占了便宜这一点很少愤愤不平，对地方性语言面临绝灭的前景也没有表示明显的不安<sup>[4]</sup>。”然而，“推普”后来并没有像预料的那样取得全面成功。“文革”中断了这一工作。事实证明，仅凭政治热情而不考虑客观实际，推普是不可能持久的<sup>[4]</sup>。

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我国的“推普”工作再次提到议事日程上，发起这场推普运动的主要有三个政府部门：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国家教育委员会和国家广电部。1986年1月国家教委和国家语委召开了“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将大力推广、积极普及普通话列为新时期语言文字工作的首要任务。会议提出在“本世纪”（即20世纪）内，推广普通话的目标是：第一，各级各类学校采用普通话教学，使普通话成为教学语言；第二，各级各类机关进行工作时一般使用普通话，使普通话成为工作语言；第三，广播、电视、电影、话剧使用普通话，使普通话成为宣传语言；第四，不同方言区的人在公共场合的交往基本上使用普通话，使普通话成为交际语言<sup>[2]</sup>。这一目标实际上并未完全实现。

90年代初，国家语委将推普工作方针由50年代确定的“大力提倡、重点推行、逐步普及”调整为“大力推行、积极普及、逐步提高”，在强化政府行为，扩大普及范围，提高全民普通话应用水平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自1982年“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载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之后，推广普通话的要求又陆续写进《民族区域自治法》、《义务教育法》、《教育法》、《幼儿园管理条例》、《扫除文盲工作条例》、《民族乡行政工作条例》、《广播电视管理条例》、《教师资格条例实施办法》等法律法规，许多省市制定了推广普通话的地方性法规和行政规章，使得推普工作在许多方面具备了法律依据，推广普通话的行政力度日益加强<sup>[5]</sup>。特别是2000年10月31日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并于2001年第一天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更是史无前例地规定了普通话作为国家通用语言的法定地位，规定了学校、国家机关、广播电视和出版物，以及公共服务行业推广使用普通话的法律责任。

1997年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确定了新世纪推广普及普通话的宏伟目标，即：2010年以前，普通话在全国范围内初步普及，交际中的方言隔阂基本消除，受过中等或中等以上教育的公民具备普通话的应用能力，并在必要的场合自觉地使用普通话，与口语表达关系密切行业的工作人员，其普通话水平达到相应的要求；21世纪中叶以前，普通话在全国范围内普及，交际中没有方言隔阂。会议将“坚持普通话的法定地位，大力推广普通话”列在当前语言文字工作主要任务的第一项，对学校、党政机关、有声传媒和公共服务行业的推广普通话工作提出了基本要求<sup>[5]</sup>。

1998年3月，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并入教育部，教育部成为主管全国教育事业和语言文字工作的国务院组成部门，并内设语言文字应用管理司和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随后，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绝大部分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和省辖市的教育行政部门都在内设

机构中设置语言文字工作处并配备专兼职干部。与此同时,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普通话培训测试中心也相继建立。这样,语言文字工作的机构建设和行政力度得到大大加强<sup>[5]</sup>。

当前国家推广普通话的基本思路是:以城市为中心,以学校为基础,以党政机关为龙头,以新闻媒体为榜样,以公共服务行业为窗口,带动全社会推广普及普通话。按照这个思路而采取的基本措施有三:实行目标管理、量化评估,开展普通话水平测试,开展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活动<sup>[6]</sup>。

## 1.2 上海的语言政策和语言使用情况

上海的官方语言政策在总体上是响应中央的号召,遏制方言提倡普通话。除了允许沪剧、越剧、滑稽剧等戏曲存在外,报刊不可登载上海方言文章,曾经有一个时期还停止上海话的广播,不能发行上海话歌曲磁带,不准上海话的电影电视播出和方言话剧的演出,也不组织专家审定方言用字,上海方言还停留在不见书面语的状态;甚至许多上幼儿园的孩子和小学生在课间休息时也不能说上海话<sup>[6]</sup>。

尽管官方对地方方言和文化采取了打压的政策,但是上海话依然是上海人的首选语言。上海话将“说普通话”称为“开国语”。一般来说,只有在较正式的场合或与外地人讲话这两种情况下才有可能开国语。在上海,一方说普通话另一方说上海话的现象是很普遍的。电视台或电台采访,记者一般用普通话提问,如果被采访者是政府官员、专家学者或企业高层管理人员,他会用普通话回答;而如果是普通市民,则多半用上海话回答,女性更是如此。纪录片中普通老百姓互相对话一般都是用上海话,旁白则用普通话。

近几年来,随着外来移民的增加和上海语言政策对普通话的提倡,上海人“开国语”的情况越来越多。以往,像售货员、服务生、公交司机这样的从事服务性质的人员,尽管他们会普通话,而且普通话可能是非常的流利,但他们还会选择上海话;在与外地人交谈时,哪怕对方使用的是普通话,他们还是常常用上海话来应答。如今,这一情况有了很大转变,服务人员有可能用上海话迎前问候,但只要顾客开口说普通话,他们一般也会改口说普通话。

最新出台的《上海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办法》进一步加强了对普通话的提倡和推广。依照此《办法》,“下列情形应当以普通话为基本用语:一、国家机关的公务活动用语;二、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的教育教学和集体活动用语;三、广播电台、电视台的播音、主持和采访用语,电影、电视剧用语,汉语文音像制品、有声电子出版物用语; (四)本市召开或者举办的各类会议、展览、大型活动的工作用语。本市应当采取措施,推动公共服务行业以普通话为服务用语。”《办法》规定,“下列人员的普通话水平应当分别达到以下等级标准:一、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为三级甲等以上;二、教师为二级乙等以上,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中除教师以外的其他管理人员为三级甲等以上;三、普通高等学校、中等职业学校的学生为二级乙等以上; (四)广播电台、电视台的播音员、节目主持人以及影视话剧演员为一级乙等以上。”《办法》对可以使用方言的情况也作了规定:“一、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执行公务和出版、教学、研究中确需使用方言的,以及戏曲、影视等艺术形式需要使用方言的;二、广播电台、电视台的播音、主持,经市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批准使用方言的。”<sup>[7]</sup>

当前,上海话处在略显尴尬的情境之中。一方面,外地人对于上海人讲上海话存有普遍的成见,认为这是一种语言歧视,是上海人排外倾向的反映。“上海热线”的电子公告栏中曾有一个“上海人的 100 个缺点”的话题,其中关于上海话的就有 3 个,“在外地旅游时肆无忌惮地大声说上海话”,“现在都在提倡讲普通话,但是,很少上海人能够做到”……上海人对上海话的维护几乎到了偏执的地步,在商场、便利店里的服务员讲上海话;当着外地人的面讲上海话,乃至上海人在外地,可能比他们在上海更讲上海话。特别是在外地人面前大

讲上海话，这已经成了上海人的“集体无意识”。另一方面，与上海成年人习惯用上海话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青少年一代的方言能力有所退化。从幼儿园开始，学校里的教学语言是普通话，许多中小學生走出课堂也只说普通话，说不好甚至不会说上海话。这一现象引起了许多争议，媒体也就上海话和海派文化的传承问题进行了多次讨论。《解放日报》上曾刊登了一封教师来信，信中说：“现在，会讲一口标准上海话的小朋友已经越来越难得了，方言文化日渐淡薄。同学们才十五六岁，可平时已经很少听到他们相互间用方言对话了，他们从小就被要求‘请讲普通话’，回到家里，年轻的父母会为了锻炼孩子的普通话而刻意不用方言和他们交流。也有许多家长反映，孩子在家中也习惯讲普通话，上海话用得少，比较生疏。”

## 2 语言的地位之争与个体的语言选择

为考察个体语言选择与语言的社会地位之间的关系，本研究采用个案研究的方法，对24名外地来沪白领进行了半结构式的深入访谈。“外地来沪白领青年”，即受过大专及以上学历，从事脑力劳动的受雇佣者，月收入在2500元以上，年龄在22岁—35岁之间，来自中国大陆的其他地区，母语非上海方言，在上海定居时间不少于一年。

### 2.1 普通话对方言的挤压：国家性对地方性的压制

国家的语言政策和上海的语言政策都带有明显的提倡普通话遏制方言的倾向。在上海日益开放的社会环境中，普通话在越来越多的场合下被使用。对于来到上海的外地人而言，一方面普通话是交际的工具，另一方面使用普通话可以抹去他们原有的地域身份标志，淡化他们作为外地人（乃至乡下人）的色彩，因为普通话是中央政府所推行的语言，是国家性所支撑的足以与强势地方文化所抗衡的语言。

所有的受访者都对普通话持有正面的态度。当问到“上海话、普通话和家乡话哪种更好听时”，24位受访者中有18位受访者认为普通话最好听，其中有3位认为带有家乡地方口音的普通话最好听，另外6位受访者持无所谓的态度。

个案一：赵先生，27岁，本科，杂志社记者，来沪时间两年半，来自河北省唐山市，听懂部分上海话，不会说

“在公共场合，我就大声地说普通话，我普通话说得比别人好，我是挺自豪的。有一次在医院里，医生问我是不是北方的，普通话说得真标准，我感觉他挺羡慕我的。”在他的眼里，普通话体现的是更高层次的文化，代表着精英意识和权威性。

作为国家标准语的普通话，其合法效用是由国家通过一系列的体制所支持和担保的。主要可以归结为以下三个方面：

#### 1、教育体制

教育体制为国家标准语的推行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普通话是法定的书面用语和教学用语，通过考试等形式，成为一种语言实践的标准，使得言说主体接受并内化普通话的语言规则，并将其视为一种代表主流文化和精英意识的语言。教育系统再生产了普通话作为合法语言的合法性。

所有受访者接受高等教育的语言都是普通话，大部分受访者所在家乡中小学校的课堂用语也是普通话。几乎所有的受访者都认为“普通话、上海话和家乡话三者相比较，普通话是最好听的”，能说标准流畅的普通话是文化素养较高的标志。对于普通话教育普及的地区，从学校体制出来的年轻一代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方言的听说能力。来自杭州市的王女士、来自黄山市的洪女士和来自福州的王女士基本上听不懂家乡方言，来自福州市的苏先生是能听懂但不会讲。他们是土生土长的当地人，但是从小接受普通话教育，课堂课外都用普通话，父

母为了使其普通话不受“污染”，在家庭生活中也采用普通话与其交流。

## 2、劳动力市场

劳动力市场（包括国家机关和行政机构）的一体化又为排斥方言、建构语言实践的新等级扮演了一个关键性的角色。国家体制利用劳动力市场为就业者提出的语言要求预先排斥了方言潜在的挑战，并保障了普通话的统治地位，使得方言成为一种地方性的、不登大雅之堂的次要语言。

1994年，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国家教育委员会和国家广电部联合发出了《关于开展普通话测试工作的决定》，并颁布了《普通话水平测试实施办法（试行）》，规定了对必须使用相应级别的普通话的工作逐渐实行持普通话等级证书上岗的制度<sup>[2]</sup>，其主要对象是广播电视播音员、主持人、教师等。1999年，人事部与教育部、国家语委联合发出《关于开展国家公务员普通话培训的通知》，铁道部、中央金融工委、国家邮政局、信息产业部、文化部、建设部等行业主管部门和各级政府机关纷纷对干部员工提出公务用语和服务用语要使用普通话的要求，一些省市的旅游、医护等公共服务行业也开展起员工普通话水平测试<sup>[5]</sup>。普通话水平的高低可能成为影响就业的关键。不仅是公务员、教师、播音员等职业需要一张普通话等级证书，在如今不需要普通话等级证书的公共服务行业，求职者可能也会因为一张普通话等级证书而更受青睐。

## 3、现代传媒

方言对普通话的让位，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现代传媒的力量所推动的。普通话借助国家的力量限制和取代方言的流通领域，并通过各种媒体从书面语和口语两方面与方言争夺使用范围。广播、电视、电话的高度普及，使得人们收听普通话和使用普通话的机会大为增加。大众媒介众口一词使用普通话，使人们在耳濡目染之中无意识无条件地接受普通话为合法语言。

个案二：罗先生，24岁，日资企业IT技术人员，来沪时间五年半，来自重庆市，听懂少量上海话

罗先生是土生土长的重庆人，却操着北方口音的普通话，当我问他为什么能把普通话说得如此标准时，他面露得意之色：“我之所以说得好，可能是小时候受电视节目的影响。我特别喜欢看《曲苑杂坛》，尤其是侯宝林的经典相声，还有冯小刚的电影、《我爱我家》这样的北京情景剧，喜欢模仿里面的段子，特欣赏葛优说话的方式。听多了，自然就会说了，都在我脑子里呢。再有，我是用普通话思考的，哪怕是说方言的时候。”

“我以前在家从来没听过上海话节目。现在在电视上说上海话的大都是说什么水管爆裂的老太婆。没有哪个明星接受采访时说上海话的，说广东话就很自然。上海话不入流，要被淘汰了，绝对不是什么时髦的语言。上海人自己有时候都不自觉地说普通话，经常听到两个上海人聊天，聊着聊着就蹦出一句普通话。”

罗先生的语言态度虽然带有强烈的个人色彩，但也确实反映出某些共性的事实和观念。在全国各地的广播电视节目上大行其道的除了新闻联播式的标准普通话，就是京味普通话和港台味普通话。京腔京调依托的是在各地收视率都很高的北京情景喜剧、贺岁片以及许多大腕级主持人的腔调；港台腔代表的则是风靡大陆的港台娱乐节目、港台流行文化。具有“权威性”的是“标准普通话”，“好听的”是“京腔京调”，“时髦的”是“港台腔”，全国各地的电视观众和广播听众对这三种腔调都不会陌生。但是上海话，除了上海本地人有可能收看收听到少量上海方言节目，其他地方的人没有机会通过大众媒体接触上海话。所以，上海话在他们眼里既不“权威”、又不“好听”、又不“时髦”，正如罗先生所说，“我以前在家从来

没听过上海话节目。没有哪个明星接受采访时说上海话的，而说广东话就很自然。”大众媒体抬高了某种语言的身价，也贬低了某些语言的地位，在潜移默化之中影响了人们对语言的评价。

个案三：李女士，32岁，大专，中外合资企业销售代表，来沪时间两年，来自黑龙江省双城县，听懂一半上海话，不会说

对方言节目的限制，也使有心学习上海话的外地人失去了一个便利条件。黑龙江双城县的李女士由于工作的需要，希望能学会上海话，但是来了两年，目前只能听懂一半。对此，她感叹“上海缺乏学语言的环境”。她原来在广州工作，“在广州，收音机里很少有普通话频道，电视剧也都翻译成粤语，特别有环境，不需要上什么粤语培训班，就看这些节目一两个月就听懂了。来上海以后，我也试图用这种方法学上海话，但是很少有上海话节目，我找了很久只发现每天傍晚六点钟的那一档情景喜剧——名字还忘了，因为老看不到开头——正好是上下班的时间，老赶不上看，只有周六周日偶尔能看看。”

媒体给大众灌输了一种印象，即方言与“封闭、保守、小农经济”等概念相联系，普通话与“开放、知识、信息时代”等概念相联系。正如美国未来学家托夫勒所说：“大众传媒同时也在散布标准化的形象。千万人看相同的广告，相同的消息，相同的小说。少数民族的语言遭到了中央政府的压制，与大规模交通的影响结合起来，导致了地方和地区性的方言与土话接近消亡，甚至全部消失”<sup>[8]</sup>。在标准语言的规范化的压力之下，方言日益边缘化。

## 2.2 强势方言对普通话的冲击：地方性对国家性的挑战

方言就其影响力而言，有强势方言和弱势方言之分。经济实力强、人口多、方言意识浓的方言是强势方言，其变化比较慢，受共同语及周边方言影响也少；反之，弱势方言则受外界影响大，因而变化快<sup>[9]</sup>。上海作为中国的经济中心，和其他地方相比，上海代表着一种强势文化。上海话作为强势方言，对普通话始终具有某种冲击作用，它所象征的地方取向不断挑战着普通话所象征的国家取向。

这种冲击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1、一些上海方言词汇输入到普通话中，成为普通话的一部分。我们现在以为很“普通”、早就习以为常、时时脱口而出的“滑头”、“流氓”、“盯梢”、“出风头”、“寻开心”、“煞有介事”、“阴阳怪气”……都是上海方言。一般来说，只有强势方言的词汇才可能向外输出。

2、上海人具有较浓的方言意识。上海话是上海人的首选语言，在所有的场合只要是能说上海话，他们就不会“开国语”。哪怕在诸如工作会议等正式的场合，讲话人经常是以普通话开头，但是讲到中途不自觉地就会转到上海话。

个案四：郑先生，28岁，本科，外企技术人员，来沪时间一年，来自福建省长乐县，上海话水平：听懂不到30%。

“我常常到成都出差，发现成都人不说普通话是觉得自己说不好，但上海人不说普通话是觉得自己有优势”。

3、许多来到上海的外地人都有学习上海话的意愿和行为。很多人认为要融入上海，必须学会上海话，从当前“沪语培训”的火爆场面就可见一斑。乃至在台湾，书店里有许多关于上海的图书，其中很抢眼的一本就是《简明上海话教程》。

个案五：洪女士，27岁，硕士，某街道党工委办公室，来沪时间三年半，来自安徽黄山，上海话水平：听得懂，不会说

“工作中要直接面对本地群众，现在是他们用上海话说我用普通话说，如果我会说上海

话就更好了，这样交流更方便。我买了教上海话的光盘正在学。”

洪女士的工作性质要求她经常与上海本地居民进行言语交流，面对习惯用上海话来表达的本地居民，她感到自身使用普通话太正式了，显得与群众存在距离感。为了更好地开展工作，融入社区生活，她希望能尽快学会上海话。

### 3 小结

#### 3.1 普通话借助政治的力量和书面标准语的作用对于各种方言有一种天然的优势

建国以来由中央政府发起的两次“推普”运动的高峰一次发生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采用的是类似政治运动的方式全民推广普通话；另一次从 90 年代初延续至今，采取的是出台各种法规并增强行政力度，针对公务员、教师和播音主持人等职业将普通话水平作为从业资格、在劳动力市场上设限的方式来加强普通话的使用。上海市政府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推广普通话的使用，包括中小学采取普通话教学、控制方言广播电视节目的数量、有关职业从业人员必须通过普通话水平测试，等等。最新出台的《上海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办法》进一步加强对普通话的提倡和推广。

普通话在现代社会的流行，既是信息交流的需要，也具有政治整合和文化整合的作用，因而受到国家意识形态权力的支持。正如学者敬文东所指出的，“普通话是指在特定的历史阶段，饱具权力、权势色彩的可通行的话语流，类似于美国的赫伯特马克库塞所谓‘全面管理的语言’”<sup>[10]</sup>。国家通过教育体制、劳动力市场和大众传媒等一系列制度安排，使普通话限制和取代了方言的流通领域。

社会语言学研究发现，社会对话语码的选择会影响个人对话语码的选择。当社会把一种语码作为标准语来推广的时候，除了强烈抵制的情況发生，这个社会的个人会在特定的条件下主动地选用该语码<sup>[4]</sup>。接受访问的外地来沪白领使用普通话作为交际的工具，普通话是他们接受教育的语言，在劳动力市场上求职的语言，接受大众传媒耳濡目染的语言，是一种“好听的”语言；是可以体现高等教育背景的语言，脱离了狭隘的地方性的代表国家力量的语言，彰显“知识精英”身份的语言，是可以让人“自豪的”语言。他们可以用普通话所代表的国家性来消解上海话对他们造成的城市性压力。

普通话对方言的使用空间的挤压，并不是上海的特例。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普通话“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但北京方言本身也在普通话的挤压下逐渐远离许多北京人的生活。正如来自北京的李先生认为，“说上海话在消失，这不是上海的问题，只要你城市到了一定的规模，现在很多北京人都不会说北京话，20 岁以下的拉出来，基本上很多也不懂。北京话不只是说话损点，带点儿化音。北京人现在说的也不是北京话了，而是京普，就是带有北京味的普通话。北京话上哪儿找阿？大兴、房山、顺义、门头沟，以及胡同里那些老爷子们，一张嘴那才是北京话。北京话与普通话不是一概念，绝对是两个概念，北京话属于方言，普通话是国家标准的语言。在我的理解中，普通话就是不让人好好说人话。普通话让你很难受，要求你很规范，除了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剩下的都不是普通话。”

#### 3.2 普通话作为中央政府推行的官方语言，是一种强势的政治符号；而上海方言作为强势经济和海派文化的代表，也具有强大的话语权

上海方言在很多场合被赋予了一种积极的涵义，是一种强势语言。正如上海作为中国的经济中心时常挑战着政治中心的权威性，上海方言作为强势方言对普通话也有冲击作用，民间浓厚的方言意识对普通话的推行构成一定的抵制。

正如当年的“外省青年”到巴黎奋斗，首先要努力去掉“外省”口音，上海话也一度是一张体面的“身份证明书”，许多外地人以顺应迎合的姿态来面对上海话。在上海，不识上

海话就要被打上“外地人”甚至“乡下人”的标签，许多外地人都经历过对着上海人讲普通话，对方却用上海话作答的事情。学会上海话或者至少能听懂上海话，可以“免受欺负”。一个典型的事例是，沪语培训班和沪语节目在外地来沪的白领群体中很有市场，而在中国大陆的其他地方（广东除外）这种现象却很罕见。

总之，语言的竞争结果直接关系到各种语言在社会生活中的使用程度和人们对语言的感情倾向，进而对个体的语言选择产生影响。

#### 参考文献

- [1] 邹嘉彦,游汝杰.汉语与华人社会[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244-245.
- [2] 齐沪扬,陈昌来.应用语言学纲要[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162-164.
- [3] 于根元.二十世纪的中国语言应用研究[M],书海出版社,1996,116.
- [4] 郭熙.中国社会语言学[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4,277-278,293.
- [5]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网站.当前推广普通话工作的背景.  
<http://www.moe.gov.cn/edoas/website18/info15932.htm>.2005年9月2日
- [6] 钱乃荣.论语言的多样性和规范化[J].语言教学与研究(北京语言大学),2005(2):10.
- [7]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网站.<http://www.shmec.gov.cn/xxgk/Attach/1750.htm>
- [8] (美)阿尔文·托夫勒.第三次浪潮[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6,54.
- [9] 李如龙.汉语方言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26.
- [10] 敬文东.被委以重任的方言[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 Social statuses of languages and white-collar immigrants' language choice in Shanghai

Zhang Jing-jing

(The Center for Modern Chinese City Studies,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2, China;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2, China)

**Abstract:** This academic paper reviews both the state and the local language policy in a historical context and argues that social statuses of languages are historically constructed. Based on a survey among the white-collar youth who came to Shanghai from other regions of China, this paper makes a discussion about the impact of language competition on individual's practice of language choice.

**Key words:** Mandarin; dialect; language policy; language choice



**收稿日期:** 2007-01-10

**作者简介:** 张晶晶(1980-), 女, 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学系硕士, 现为上海市档案馆《档案春秋》杂志编辑记者。